

# 1 章

## 引言

### 1.1 研究目标

韩国近 40 年来的经济发展几乎受到普遍的赞誉。除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外，没有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能与其蓬勃的增长相比。对那些熟悉韩国当时社会经济形势的人而言，韩国工业化的速度简直是一个奇迹。韩国于 1945 年从日本统治下得到解放，当时韩国位于世界上最穷国之列，然而过了 40 年，韩国已成为一个工业国。

韩国解放后，随之而来的政治混乱和经济崩溃令人畏惧。幸存下来的经济在 1950~1953 年那场灾难性战争中遭到破坏。直到 50 年代末，韩国也只能是勉强维持生存。没有一个人能够想像像韩国这样一个国家能在国际经济界作为一个工业化国家得到承认。在发展中国家，韩国是屈指可数的获得经济成功的国家之一。仅此而言，对于那些研究经济的人来

说，韩国的经济发展就是十分了不起的。

有关韩国经济的著述很多，其成功的历史也由人一再转述。然而，作者认为仍有必要写这本书，因为韩国成功的真谛并未被韩国人乃至其他国家所充分了解。此外，韩国国内及国际上近年来的一些变化也迫使韩国进行有深远意义的调整。因此，就需要对韩国经济发展提出新的观点。韩国正要迈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那些在过去指导韩国发展的理论已日趋过时。

本书的研究目的就是根据近年来韩国国内外的一些变化，提出韩国经济发展的新观点。作者将评价近 30 年来韩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并分析在今后几十年中韩国将面临的障碍和前景。作者会提出克服障碍的指导性策略以及如何利用机遇。通过回顾政界、企业界和产业界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作者希望能突出描述韩国发展的独特模式并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解释韩国成功的原因以及这一成功所可能带来的影响。

韩国的经验之所以值得仔细研究有如下几个原因：第一，韩国所遵循的发展道路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成功的发展道路十分类似，因此，通过仔细的研究，可以帮助经济学家对当代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进程制定出一套有关的并带有普遍性的方法。第二，对研究经济发展的人员而言，韩国能否最终发展成为一个经济上的发达国家仍然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在 19 世纪，日本是惟一个实现现代化的非欧洲国家，日本的经验一直引起社会学家的兴趣。在战后时期，韩国和其他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经历了相似的改革。韩国可以在多长时间内跻身发达国家之列将是社会学者十分感兴趣的问题。在世界经济史中，韩国未来改革的传奇意义将不亚于日本。

## 1.2 对过去经济增长的看法

### 1.2.1 密集增长

如 2 章所述，韩国国民生产总值在 1961 年以前增长十分迟缓，但自 1962 年第一个五年经济发展计划开始执行以后，便加快了增长速度。除台湾等地区外<sup>[1]</sup>，只有少数发展中国家达到了这样高的增长速度。

在 60 年代和 70 年代，韩国和台湾地区的增长率超过了发达国家在发展同期的增长率。从 1886 年至 1913 年，美国取得了在先进国家中 4.3% 的最高年均增长率。日本在 1913 年至 1938 年战争期间增长率达到 4.5%<sup>[2]</sup>。从 1868 年明治维新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虽然创造了持续快速增长的记录，但却不能和 60 年代到 70 年代的韩国和台湾地区的经济增长相比。只有在战后时期，日本取得的相应增长率才能与韩国和台湾地区相比。从 50 年代到 70 年代，日本的年均增长率约为 10%，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的水平。

近 30 年来，韩国和台湾地区从传统的农业型经济过渡到工业型经济。韩国和台湾地区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可以和发达国家在 100 多年中的成就相比，也就是说韩国和台湾地区将需要 1 个世纪才能取得的发展成就缩短为 30 年。

同样，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人均收入只有美国的 17%。在战后时期，日本成功地从一个经济、技术落后的国家转变成一个发达国家。日本也将通常为漫长和缓慢的经济成熟期浓缩为几十年（本章还要解释日本的增长过程在某些方面的确与韩国和台湾地区的典型的、简单的密集增长

过程不同。

这里出现了几个有趣的现象。第一，取得密集增长的韩国、日本和台湾地区有着相似的自然条件。第二，它们均在战后大约同一时期取得了高速的发展。上述两个事实说明，它们的相似经历不是一种偶然的事情，一定有某些共同的因素促成了它们的高速发展。

首先应该指出的是它们在资源条件方面的相似。韩国的煤、铁、钨、石灰石和高岭土等资源十分有限，而其他资源也很少或没有，即使是发展农业的资源也不充裕。可耕地只占全部土地的 20%，气候、土壤、降雨量和温度都对发展农业生产不利。台湾地区和日本的自然资源也不比韩国强多少。由于贫瘠的自然资源，台湾地区、日本和韩国需要进口发展工业的大部分原材料。即使台湾地区、日本和韩国单位土地的农业生产率在世界上位于前列，它们仍要进口相当数量的农产品。

与贫瘠的自然资源相比，韩国有较好的人力资源。1992 年，韩国人口为 4370 万，比 50 年代初增加了两倍。韩国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国家之一，每平方公里 440 人。除城市化国家之外，孟加拉国人口密度最大（每平方公里 499 人），韩国仅次于台湾地区（每平方公里 533 人），列第三位。<sup>[3]</sup>

由于人口众多而又国土狭小，韩国在发展的初级阶段到处是剩余劳动力。只够维持生存的工资率主要取决于农业因素。事实上，在韩国发展经济的初期，农村到处是隐形失业，而城市则可见公开失业。开发城乡的可能性主要在于制造业有效利用这些剩余劳动力。确切地说，不是所有有剩余劳动

力的国家都能有效地发展制造业，这些劳动力需要具备现代工业活动所需要的条件，如最低标准的文化、纪律性和“超过别人”的想法，此外，还需要有活跃的企业家能力、行政管理技能和政府的效率。

在这方面，韩国人民具备制造业所需要的条件。多年来在稀少的土地上去维持生计培养了强烈的生存意识，如坚韧不拔和务实精神。潜在的劳动力大部分具有文化并愿在低工资条件下长时间工作。许多具有“敢做”精神的企业家脱颖而出，他们得益于政府鼓励用有利的银行贷款和外汇分配去投资的政策。

许多经济学家都同意这样一种观点，即韩国成功的原因在于采纳了出口引导型增长战略。但这种观点引出了两个问题：为什么其他发展中国家没有采取同样的出口引导型战略？为什么有些采用了出口引导型战略的国家没有取得像韩国那样的成功？举例说，与拉丁美洲国家相比，韩国之所以能更容易和有效地采用这一战略有两个原因：第一，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相比，韩国在发展阶段的相对优势在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第二，出口引导型战略使得韩国能利用其相对优势。这一战略还使韩国可以充分利用剩余要素（即劳动力）并解除由于缺少其他要素（即自然资源）而造成的羁绊。因此可以看出，韩国的出口引导型战略在整个 60 年代都是引导韩国人民去除传统束缚所做的一种政策选择<sup>[4]</sup>。这一战略在 60 年代得到有利的国际环境的保障而得以执行。

### 1.2.2 促成密集增长的因素

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战后东亚有剩余劳动力的国家更能发展制造业。人们记得亚历山大·格申克龙曾证明，一

个不发达国家的工业化速度往往要比发达国家快，主要原因是它可以利用更发达国家的技术革新成果。如果用本书的表述来换句话说，就是落后国家可以通过发展和技术革新来“浓缩”工业化进程<sup>[5]</sup>。韩国、台湾地区以及日本似乎证明了格申克龙的理论，虽然这些东亚国家和地区还有其他一些有利于发展的因素。

首先，与 19 世纪开始发展的国家相比，今天无论是技术还是资本都更容易引进。以现在的发达国家而言，它们的技术和资本以前大多是来自本国。资本要通过几代人的努力去积累，而技术则要通过艰苦的学习过程来不断提高。然而现在的发展中国家可以在发展的初级阶段省去这一过程。它们可以引进技术和资本，因而可以消除出口引导型增长的障碍。

第二，对今天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小型国内市场不再如以前那样会束缚发展。根据传统的贸易理论，一个出口国家在开发海外市场之前通常要满足国内市场，以收集用户的喜好并使消费者喜欢其产品。随着收入的增加，与外界隔离的国内市场也会扩大，这当然是一个很慢的过程。50 年代流行的经济发展的“大推动”模式旨在通过投资的“大推动”来打破这一特殊的瓶颈。

但在战后年代，发达国家几乎没有限制的市场给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国敞开了大门，就如同那些国家掌握了这些市场的信息一样。此外，发展中国家出口的产品通常符合标准，发达国家对产品的要求事实上得到了保障。所以，在发展的初始阶段，现在的发展中国家在向海外市场出口产品之前，不再需要发展国内市场，它们甚至可以在国内消费者青睐其产

品之前就将产品出口到国外。

对当今资源缺乏国家而言，在战后技术发展模式方面还有第三点有利因素。资源节约型技术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制成后产品的资源含量不断大幅度降低，资源贫瘠的国家对此大为宽慰。近年来，资源节约型技术取得了各种各样的进步，正如同能源技术所展示的那样。因此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相比，资源已成为次要的束缚。对劳动力剩余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报酬递减率正成为次要的痛苦。

最后但并不是最不重要的一点是，今天的世界已不像 100 年前那样被帝国主义所主宰。根据传统的概念，只有最发达和最强大的贸易国才能从自由贸易中获利。19 世纪就是如此，发达国家无一例外地强迫欠发达国家开放口岸。在这一时期，发达国家的商船往往装备有枪炮。而今天，欠发达国家在与发达国家的贸易战中处于优势地位。亚当·斯密在他的《国富论》一书中指出，富国和穷国之间的贸易将使双方受益，但后者比前者相对收益要多，前提是前者不使用武力。斯密的预言今天已部分得到证实。

至此 我们已讨论了过去 30 年来对韩国和台湾地区以及 1955 至 1973 年对日本“密集型”增长有利的因素 这个因素对三者而言多少是共同的。然而，有趣和重要的是 韩国、台湾地区和日本在发展战略和经济管理方式的推进上存在着诸多的不同之处。这些不同点可能会说明三者在经济运作和社会环境方面为何不可避免地会存在偏差。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任务就是要搞清三者的共同因素和不同的发展模式。

### 1.2.3 政府的作用

总的来说，与台湾地区和日本相比，韩国政府在发展经

济方面的作用更为直接和积极，其结果是，韩国在收入增长、物价、贸易和体制改革的模式等方面的发展更加不平衡。

在这里，格申克龙的理论再次提供了可供参考的基本框架。他提出，一个发展中国家倾向于建立一个与发达国家不同的工业机构，其落后的程度越高，政府的作用越大，发展的不连贯性和不平衡性也越大，所表现的不同程度取决于落后程度。韩国和台湾地区的经验不一定完全吻合格申克龙的理论，但该理论的确能就韩国和台湾地区的发展做出某些说明。韩国发展的不平衡事实上归因于韩国政府主动和直接的作用，而产生这种作用的原因是韩国民众的紧迫感。

由政府推进的浓缩型增长是以放慢社会体制和制度的变革为代价的。近 30 年来，政府就韩国经济的管理做出过许多重大决定，但这并不是说没有政府的参与经济发展就是不可能的。确实有过这样的情况，即使政府高级决策人犯了错误，但由于工人和民众的持久耐劳而保持了经济发展的势头。如果说韩国政府在努力发展中对人力和制度因素给予了应有的注意，那也不是事实。事实是在 60 年代和 70 年代，由于过多地注意尽早赶上发达国家这一目标，忽略了将人力和制度因素作为长期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于是将特有的不平衡结构模式作为一种继承物保留了下来。这里要强调的是，韩国政府提倡了业已存在的人民先发展精神，并定下了发展的调子，使它具有有一种韩国特色。只有了解韩国政府的政策，才能理解韩国经济的所有结构特点、大企业和小企业之间的不平衡关系、劳动管理关系和金融业的结构等等。

另外一种观察韩国发展的方法就是通过相对集约而言的粗放增长特征。近 30 年来，韩国浓缩型增长是粗放型增长方

式的一个变种，也就是说它来自对国内及引进资源和技术的使用。由于粗放型增长对资源如原材料、劳动力和机械等的消耗，其增长必定会带上一种不断增加的集约型特征。这就意味着为了不断取得迅猛的增长，国家必须开发集约增长的源泉 即通过国内的革新和改造来提高现有资源的生产率。根据微观经济的水平，这些提高的内容可以包括建立企业文化，以此来鼓励技术和管理的革新并促进更为和谐的劳工管理关系；根据宏观经济的水平，这些提高的内容包括竞争市场系统效率的提高、寻求经济更好平衡的工业体制改革以及政府组织管理方面的改革。在经济社会中，可以恰当地称这些为“软件”而与之相对的硬件则包括诸如微观水平的工厂和设备与宏观水平的法律和管理机构。浓缩型增长主要依靠硬件，但以后的集约型增长则应更多依靠软件。

经济上的硬件和软件的主要区别是前者可以引进而后者则不能。工厂和设备可以引进，技术也可以引进，但管理革新和本国的技术则不能引进。法律和管理机构及政府组织改革可以轻易地模仿其他国家，但运作的具体方法却不能轻易照搬。

即使是在浓缩型增长时期，发展中国家也应准备应付这样的情况，即由于开发集约型增长源而使浓缩型增长源枯竭。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对此有所准备，它将继续增长；如果没有准备，代之以密集增长的将不是一种正规的集约型增长过程。一个从浓缩型经济转变为集约型经济的最好例子就是 1955 年至 1973 年日本的经验。在这一时期，日本的经济取得了一种浓缩型增长，但同时它通过加强技术能力、提高企业文化来改进劳资关系而成功地开发了集约型增长源。在韩国

经济中，集约型增长源并未得到令人满意的开发，而目前的经济困难也正是出于此因。

### 1.3 研究范围

在本书中，发展过程的陈述将重在强调政府的作用，而其他有关著作却着重分析经济的变数。如果没有这样一个中心，则很难去了解韩国配置资源的方法，去理解在建立经济结构方面机构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去制定经济政策的方向。鉴于本书着重分析政府的作用，因此内容将强调政治经济。

作者所提出的问题不完全是量性的，因此答案也就不会是量性的。确实，本书中的问题不完全是经济方面的，有些是属于社会文化方面的。这里所研究的问题完全没有与量性分析有关的那种精确度。因此本书采取的是历史和政治经济的论述方式。作者在引述自己做出的判断的时候，将把论述立足于事实上的观察。

本书包括 8 章，2 章和 3 章对韩国近 40 年来的发展做出总的描述。作者用少量的宏观指标突出论述了发展，也对韩国政府在 60 年代初期制定的发展战略的要点提出看法，同时回顾了这些要点在五年计划期间是如何被贯彻的。

在 2 章和 3 章论述了基本发展战略对浓缩型经济增长发挥的作用，但该战略同时也造成了一些棘手的体制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在本书的其他章节加以论述。特别要指出的是，4 章讲述了企业家地位、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详述了韩国企业家地位的特性、经济权利集中所带来的问题以及缓解这些问题的政策。5 章详述了与劳工有关的问题，其中包括近年

来的劳工管理风波、飞速增加的工资和工会的主要特征。6章列举了与金融有关的问题，其中包括银行的发展、非银行金融机构和资本市场。7章论述了对外贸易、韩国经济在世界上的地位和韩美贸易关系。8章总结了作者对韩国经济发展前景的看法。每一章都用与政策有关的论述收尾。

## 2 章

# 50 年代和 60 年代韩国的经济发展

### 2.1 发展概述

韩国于 1945 年从日本的统治下解放以后，经历了大规模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动乱，其严重程度难以形容。1948 年成立的政府做出巨大的努力来恢复生产设施和抑制通货膨胀，并且在 1950 年 6 月朝鲜战争爆发之前取得了某种程度的成功。残酷的战争持续了 3 年，使这个摇摇欲坠的国家损失了 2/3 的生产设施和近 150 万条生命。1953 年停火以后，在美国的经济援助下恢复战争创伤的工作进展迅速。到 1956 年在很大程度上完成了重建工作，恶性通货膨胀得到了控制<sup>[1]</sup>。但是韩国经济严重依赖美国的经济援助，而且缺少一个持续长期增长的计划。直到 60 年代早期政府推出第一个五年经济发展计划时，韩国经济才找到了高速增长的道路。因此，韩国发展的成功是从这时开始的。

## 2.2 50 年代的发展和经济政策

### 2.2.1 韩国发展中最重要的事件

一般认为 50 年代只是一个经济停滞的时期，人们认为政府并没有做多少努力来促进长期的经济发展。在这 10 年中，政府变得越来越专制和无用，经济管理受到浪费和低效率的困扰。但是，50 年代国家的确实现了几个重要的政策目标，成为 60 年代较快增长的基础。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50 年代是为下一个十年和其后几十年做准备的时期。不可能详细描述这一时期发展的所有重要方面，这里只强调几个比较重要的成就。

第一个成就是 1950 年宣布并于 1954 年实施的农地改革。1945 年解放后，在公众意见分歧的气氛中，左翼和右翼对指导土地改革的原则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右翼政府最终采纳了一项以“有偿征用”和“有偿分配”为基础改革农地所有制的政策。政府从土地所有者那里购买土地分配给耕作农。结果，农村社区拥有土地的士绅阶级的经济基础坍塌了，出现了许多独立的农民。一种佃农耕作制度取代了传统的收益分成佃农耕作制度，从那时以来农业部门的生产率不断提高。<sup>[2]</sup>

韩国政府本来希望能引导原土地所有者们用政府付给的补偿金开办企业，并最终成为工业资本家。这一期望没有得到实现，这些土地所有者们只是失去了他们的土地。部分原因是这些土地所有者们得到的补偿不是金钱，而是在 5 年期间以 5 次等额分期付款偿还的 5 年到期的担保金。由于在偿

还期中迅猛蔓延的恶性通货膨胀<sup>[3]</sup>，这些担保金的实际价值迅速下跌，有时甚至连每年的付款也不能及时支付。实际上政府没有用多少补偿就把这些土地从土地所有者那里没收了。大多数土地所有者完全丧失了他们的生计，也没有成为工业资本家。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发展是出售解放后由美国军事当局接管的原日本人拥有的企业和财产。这些企业大约有 600 个，其雇员占 1948 年制造产业雇员总数的 48.3%（韩国工业协会，1986，755）。出售这些企业是当时一个重要的政策创新，它反映了从那时起韩国政府遵循的基本政策路线——维护自由企业制度。

根据 1948 年颁布的第一部宪法的条款，韩国将成为就像德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时期制定的魏玛共和国宪法所设想的那样一个福利国家。宪法规定了自然资源的国有化，对关键产业的国家所有制，以及劳动者分享利润的权力。它还强调了社会公正和均衡的经济发展。1954 年对这个福利国家型的宪法进行了修订，允许私营部门发挥更大的作用其后韩国的经济体制具备了更多的自由市场特征。根据新宪法所设想的经济政策取向，韩国的产业政策迫在眉睫的任务就是将以以前由日本人所有和经营的财产及生产设施卖给未来的企业家。政府为此采取了大规模的行动：除商业银行及一些公用设施外，大多数前日本人的财产都卖给了个人。

那些获得这些财产的人得到了意外的资本收益，因为这些财产的售价大大低于市场价值。这些受益人要么是原来的雇员，要么是以前与这些企业有关系的人，其中的许多人成为成功的实业家并成为韩国实业界的领导人。他们是出现并

开始积累资本的重要实业家阶层的核心。

1953 年停战以后，韩国在美国的经济援助下建立起了轻工产业，其中最重要的行业有食品、水泥、化肥、纺织品和纸张。电力设施得到了扩大，并且在交通、通信、教育和住房方面进行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这些投资为 60 年代的工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50 年代韩国经济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对美国经济援助的依赖。在朝鲜战争以前，美国的援助大多是食品和救济物资，但在战争以后的美援包括了用于工业的原材料和资本货物。这一时期来自美国及国际组织的援助总额达到了约 30 亿美元。国际援助于 1957 年和 1958 年达到了高峰，1959 年开始缓慢地减少，于 60 年代末结束。在 50 年代后 5 年，美国的援助占了总进口的近 80%。

在朝鲜战争前后，韩国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在经济重建的初期，大多数资本形成都是靠美国援助提供资金的，来自国内资源的资本形成比例极低。50 年代，国内投资总额占可支配国民总收入的 12%，对社会间接资本（基础设施）和生产设施的大多数投资最终都是靠美国援助才成为可能。

关于美国援助对韩国经济的影响，人们已经写了许多文章。根据一些经济学家的观点，美国援助对韩国经济的发展促进并不大。没有多少韩国人认为经济援助产生了预期的效果，甚至美国当局对经济援助效果的评价似乎也不很积极。许多人认为美援没有促进韩国的资本形成，因为美援大量向消费品倾斜。美国援助中只有 12% 是资本货物，而大部分都是在消费品方面（Steinberg, 1985, 26）。美国和韩国的批评家

们认为，由于援助主要是剩余农产品和消费品，因而阻碍了韩国农业的发展和国内产业的兴起。另外，许多人认为美国的援助主要是为了维持专制的李承晚政权。美援当局也感觉到韩国政府只是对最大限度地获得美援感兴趣，因而忽视了建立实现长期发展的政策（Steinberg, 1985, 21）。这些评价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 50 年代对韩国政治和经济形势普遍的失望感。

公平地说，也许应该承认，美国的援助的确做出了某种重要的贡献。尽管这种援助在很大程度上偏重于经济稳定的短期目标，但它使韩国渡过了困难时期，并使这个国家得以进行许多重要的投资，形成了后来发展的基础。

例如，用出售援助物资所得的收益、以韩国货币建立的“对应基金”为很大一部分韩国政府预算和对社会基础设施及关键产业的投资提供了资金。这项基金还成为韩国建设银行贷款的一个重要财源，该银行是为了基础产业融资于 1954 年成立的。此外，美国的援助使韩国人能够对教育机构进行投资——这一时期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是随后几十年韩国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 2.2.2 主要的经济政策

50 年代韩国政府没有能够建立起一个协调的发展政策。正如前面所提到的那样，韩国的经济生活以及政府的预算在很大程度上是靠美援来维持的。一切都面临着短缺，政府的精力都投入到了日常事务上而无暇顾及有关长期发展的计划。制定长远的经济规划已非政府力所能及，当务之急是通过增加日用必需品的供应实现物价稳定。为了达到这些目标，韩国政府坚定地实行了“三低”政策<sup>[4]</sup>：低粮价、低利率和低

汇率（即高估国内货币）。

粮食，特别是稻米，是 50 年代韩国经济生活的中心。稻米价格成为通货膨胀惟一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对于政府来说非常重要的是要保持尽可能低的稻米价格。这一点是通过进口美国剩余农产品来实现的。随着从美国进口粮食步伐的加快，粮价急剧下跌，粮价的急剧下跌又降低了国内农民生产粮食的积极性。尽管这样做对农民有害，但政府还是继续进口美国的剩余粮食以安抚政治力量很强的城市人口。

在这 10 年间，商业银行是由政府所有和经营的。为了帮助企业，银行贷款的利率一直保持在很低的水平上。即使在朝鲜战争前后恶性通货膨胀时期，根据将最高名义贷款利率硬性规定为 20% 的《最高利率法》，利率定得也很低。这一时期的实际利率一直是较大幅度的负利率，这实际上是在给借方补贴。为重点项目融资的贷款利率就更低了。尽管韩国银行的决策机构“金融通货委员会”提出了建议，但在这一时期并没有取消《最高利率法》。那些购买了原日本人拥有的工厂和设施的人除享受低利息贷款带来的特殊好处外，又获得了意外的利润。

这种对借方的隐含补贴是以储蓄者为代价的。因此，低利率政策对银行业的长期发展是一种强有力的抑制因素。机构融资以外的民间货币市场利率非常高，这样便保持了无组织货币市场上的正利率。由于人们回避正式的金融机构，国家的大量资金通过非正式的货币市场流动，使一种双重市场结构得以长期存在。机构融资部门中的低利率阻碍了中小企业的兴起，因为它们大多被拒于银行大门以外而不得不按很高的名义利率从无组织货币市场借款。